

中国经济学家有望领先世界

全部经济学因为互联网都要重写

■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如下领域, 我们已经具备了创造中国学派经济学的条件。

1、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2015 年, 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 工业化是 3000 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虽很有趣, 但不重要。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因为, 从大的方面看, 世界人均 GDP 在 1800 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 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在工业化之前,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经济增长都服从马尔萨斯定律, 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 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 继而人均收入增加, 为下一轮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 可是, 人口增长后, 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又会减少, 生存挑战越来越大, 进而导致战争或瘟疫发生, 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 如此循环不已。工业化打破了这个循环, 因为工业化使得创造生产资料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基于此, 人类可以进行“迂回生产”, 从而大量的科学技术就能对象化, 财富才可能不断积累。这一切都导致生产率不断提高。

接下来的问题是, 工业化如此重要, 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英国? 西方经济学家的结论是, 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 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实现的, 继而实行了宪政, 在意识形态上, 则归功于启蒙运动, 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世界标准, 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 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么一步步走下来的。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 我们的工业化既有类似“承包制”的体制变化, 也有维持集体所有, 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取得重大突破, 等等。归纳而言, 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新、集体组织的转型, 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凡此种种, 都是与西方传统不相同的, 因此, 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 抽象出其中成功的要素和内在逻辑, 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我们可对经济学做出中国的重大贡献。

2、人口: 从负担到红利

近年来, 理论界乃至政府部门都在谈人口红利。大约的意思是说,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靠的是收获了两种红利, 其中, 人口红利贡献最大。但如今(大约从 2012 年开始), 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 今后我们需要创造改革红利, 云云。需要指出的是, 在改革开放之初, 就是在我们这代人上大学时, 说到人口, 从国内到国外, 从政策到理论, 众口一词地认为它是中国发展的“癌症”、“死荷重”。因为有了过多的人口, 而且人口结构高度年

轻化, 中国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和吃饭问题, 所以需要控制人口, 于是就有了如今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关于这个问题, 新中国以来还有著名的马寅初和毛泽东同志的争论。马寅初坚称人是“口”。鉴于粮食人多, 所以要计划生育, 减少人口。毛泽东坚称人是“手”,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当时的条件下, 马寅初显然是对的。但是,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 我们显然是在“人口红利”的概念下, 享受着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众多人口。如今, 红利将逝, 我们需要努力延长人口红利, 还须创造其他红利。

这又是一篇大文章。同样是人口, 如何从谈之色变的癌症, 变成令人难以忘怀的红利, 阐述清楚其中转变的体制、机制、技术变化过程, 发掘出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 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中国将向世界, 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 奉献出无与伦比的理论贡献。

3、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 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只是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 政府越小越好, 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 从“单个的人”出发, 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 伴之以“看不见的手”, 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从实践上看, 西方经济学大致上反映的正是西方经济社会的现实。

中国的经济发展, 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 因此, 在中国, 理想的要求, 良治的社会, 不是小政府, 而是好政府。基于这一实践,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 都不是从个人出发的, 而是从集体出发, 讲求的是在集体发展起来之后, 个人享受其应得的一份。中国的经济学, 目前当然还不成体系, 但是, 我们宁愿说是因为我们未能很好地整理和继承。中国自隋以来便实行科举制度。在此制度下, 若能从主要拷问四书五经的乡试中脱颖而出, 参加殿试, 则皇帝要考的是“策论”, 那都是一些“治国平天下”的思路, 其中当然以经济为主。中国的经济学强调的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 这与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

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 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 囿于西方经济学, 多数人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 却都认为, 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 一旦越过这一阶段, 我们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更有一些心怀巨测者套用西方经济学概念, 称中国的成功, 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 从而, 事实上也动摇了西方经济学整个基础。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 “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 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 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 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 构造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 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不是守夜人), 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 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创造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梦想是能够实现的。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 他勾画出的经济社会体系, 是由无数个人通过契约连接起来的。然而, 作为一位科学家, 他在晚年接触到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某些文献资料之后, 便敏锐地认识到, 在远东, 存在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那里, 一切从社会总体出发, 并以总体与个体的和谐为归宿。因此, 应当有一个远东特色的经济学, 而且, 马克思已经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下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只是天不假年, 这项研究未能完成今天, 中国的经济学家理应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

4、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门大分支专门研究发展问题, 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体系上说, 发展经济学无非只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领域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 由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 大约说的意思是, 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 是因为那里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 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 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 破解双缺口, 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 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關鍵。

这次危机证明,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双缺口的状况基本未得改善, 这才造成: 在危机的头几年他们发展十分迅速, 以至于有“双速脱轨”之说, 然而, 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 大量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回流之时, 人们沮丧地看到“双缺口”依然如故。在这个背景下, 人们注意到又一个事实: 中国自 1994 年开始, 便从根本上冲破了“双缺口”。因此, 只有中国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影响, 基本可按照自身设定的目标保持着稳定的增长。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总结这个奇迹中的关键环节、体制机制安排, 并由此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畴, 进而用某种逻辑将它们构成体系, 便能形成一套漂亮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 当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5、城市化问题

今天, 中国的城市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从近年来的情况看, 沿着老路已经走不下去。实践让我们反思: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否也犯了照搬西方的错误呢? 深一步分析, 是否城市的功能及概念在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 从而, 城市化的理论, 中西方也是两个套路呢? 我们倾向于肯定。如所周知, 欧洲城市化兴起之前, 存在的是“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 因而, 那里的政治格局, 是“乡村统治

城市”(《共产党宣言》语)。在中国, 城乡关系从来就与此相反。因此, 基于欧美的实践谈城市化, 同基于中国的实践谈城市化, 可能就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 当我们希望从西方国家借鉴城市化经验时才发现, 在那里, 城市化从来就没有被当作特别重要的问题看待, 从而在西方, 像样的理论著作十分鲜见。因此, 中国的城市化, 包括其含义、目标、起点、过程、影响、城乡互动机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等, 都应重新考量。

于是,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 我们要特别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 要特别重视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理论。事实上, 在我国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安徽等省, 用传统西方标准来衡量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一方面, 那里的农民不愿意用其在手的土地用益物权去交换一个城里的市民身份(所谓“市民化”); 另一方面, 这些省份的乡村和小镇, 真正是“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有乡愁”的, 进而已经开始在吸引着城里人向乡村流动。我们要做的, 是总结这些地方的经验, 提炼出概念, 找出规律, 形成理论。在我看来, 或许我们需要继承当年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之路。须知, 他的《江村经济》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而这种中国特色的研究, 在上世纪初就已获得国际公认。

6、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

大家都知道, 互联网正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我们的一切。这种改变“大象无形”, 以至于我们离开它已寸步难行。目前, 全世界有大量经济学家在研究互联网问题, 虽然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推出, 但大家一致同意, 全部经济学都应当重写。它对金融的冲击也是致命的, 基于互联网, 我们的经济社会可能产生出“去央行化”的私人货币, 从而走出货币被消灭的现实道路。在这基础上, 全部的金融学也应当重写。

为什么在讨论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时提这个问题呢? 因为, 现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 在互联网的发展上基本走在前列。这一丰富、前卫的实践, 当可为创立基于互联网之上的经济学、金融学的新版本, 提供无比坚实的实践基石。简言之, 中国的经济学家若认真总结中国发展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的经验, 提炼、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畴、规律、模式和体系来, 当能产生出领先世界的经济学成果。

三、简短的结语

事实上, 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远不止以上所列六端, 只不过, 在我看来, 以上六个方面, 已经成熟到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程度了。

写下这篇文字, 无非是想强调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来, 必须从中华文明 5000 年历史中寻找她的根源。而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 张扬科学和学术的大旗, 则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二法门。

在大数据时代, 对于新计划经济引发的争论需要引起关注, 它的起源虽然只是大数据的计算和应用, 但它带来的影响则有可能超越技术层面, 带来政策层面甚至思想层面的分歧。鉴于中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成就和经验, 鉴于中国未来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道路上, 而不是任何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

马云有关的新计划经济的看法

最近, 围绕马云有关“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义”的观点, 在国内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 参与的学者越来越多, 甚至大有引发言论之势。围绕这个似乎早有定论的问题, 再度出现大量的争议, 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 有必要进行分析。

为了准确起见, 这里先引述马云关于计划经济的原话。从去年到今年, 马云在两个比较大的公开场合谈到了计划经济问题。一次是 2016 年 11 月 19 日, 在由浙商总会和上海市浙江商会联合举办的“2016 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 马云谈到: “昨天在一场交流里, 马克思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 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

新计划经济论的可能影响值得警惕

■ 安邦

济非常之好, 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 因为数据的获取, 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另一次是 2017 年 5 月 26 日, 马云在贵阳数博会上发表的《数据创造价值 创新驱动未来》的主题演讲。(据第一财经网报道) 马云当时称:

“去年我提了一个观点, 我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 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 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 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 未来三十年,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一致批判, 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这里我自己先告诉大家, 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 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 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 我想问大家, 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愿意摸到, 你愿意做计划吗? 在大数据时代, 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 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 人类取得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的速度能力也远远超过大家。所以, 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 由于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 由于大数据, 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经济学家们的看法

马云对计划经济的看法, 迅速引来了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反驳。钱颖一、吴敬琏和张维迎这三位经济学家分别在不同场合对马云的

新计划经济论予以批评。据媒体报道, 钱颖一认为, 20 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 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 但这个实验完全归于失败,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突出例子。

吴敬琏认为, 东欧经济学曾一直致力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即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 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 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 而东欧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 这个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张维迎认为, 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错误在于, 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 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 企业家必须看到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财经》主笔马国川认为,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现有体制又包含大量的旧有计划经济时代残余, 计划经济思想非常容易得到官员们的追捧, 计划经济非常容易“复活”。这也正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于新出现的以大数据等科技发展为由支持计划经济的言论保持警惕的原因, 也是我们要关注这场争论的理由。

如吴敬琏所说, 中国目前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 “它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 也包含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如果放任政府强化配置资源的权力, 国民经济就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

展。只有全力推进改革, 通过限制行政权力, 使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 专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才能建设成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在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站在改革一边, 不能有丝毫动摇。

搜狐网“学术争鸣”转引的一篇文章则认为, 经济学家拿从历史、理论和现实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 并没有击中要害。这位作者表示, 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数据经济, 而是权力经济。在作者看来, 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在于, 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 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 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 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了 20 多年, 结果是百业凋敝, 民不聊生, 生产和生活资料长期处于短缺, 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所幸, 中国在文革之后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 激发了社会的巨大活力,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际上, 像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 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还有学者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 成绩巨大, 同时问题也很多。成绩来源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问题则来自于市场经济在法治不完善条件下向权贵经济的转化, 相当一部分权贵经济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变异而

来, 权贵集团通过权力部门的垄断、管控和影响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 并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合法”地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该学者认为, 马云现在重提计划经济, 无疑是想继续做大做强企业, 而数据化的计划管理显然是更有利于他的企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ANBOUND 看法

要强调的是, 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关于中国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问题, 中央已经有明确定论, 不会因为一场理论争论而更改。但要警惕的是, 当中国还处在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时, 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还没有完成时, 当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还在进行时, 思想和理论上的争论可能会引发政策之争甚至道路之争。

因此, 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 也不是数据化管理,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其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权力经济, 是国家支配经济资源配置和经济组织的系统, 而不是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 要让市场来主导资源配置。

在大数据时代, 对于新计划经济引发的争论需要引起关注, 它的起源虽然只是大数据的计算和应用, 但它带来的影响则有可能超越技术层面, 带来政策层面甚至思想层面的分歧。鉴于中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成就和经验, 鉴于中国未来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道路上, 而不是任何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